

# 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几个问题\*

杨增崇

**[摘要]**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优秀基因，蕴含着丰富的可被现代学术提炼的哲学智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构成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性、自主性根基。在全球化格局深度调整、文明交流交融交锋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时代需求、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激活这一丰厚历史资源的现实路径，更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激活思想源泉、厚植精神根基。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传统复归或理论移植，而是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中催生知识内生动力，在守正与创新的动态协同中实现理论范式突破，在主体性坚守与开放性借鉴的辩证统一中达成价值共生。通过强化学科交叉融合、系统整合学术要素、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推动知识生产的原创性突破与体系化建构，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关键词]**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114X (2026) 02 - 0067 -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sup>①</sup>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任务，既是形塑中华文明现代叙事的深层探索，更是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以中国实践为根基的知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项目号23&ZD00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北京师范大学“面向全球倡议的中华文化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原创性理论贡献研究”（项目号1243300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增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京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主体性觉醒。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自主”一定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作为基础性支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许多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与范畴，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双创”）的过程，也是这些思想精髓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激活下实现现代转换，逐步转化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这便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学理性的深度萃取、概念范畴的现代转化、价值理念的创新性阐发，使之与当代中国实践、时代发展深度融合，有机融入当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概念框架、理论范式与价值标准之中。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见，当前学界普遍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静态遗产，而是具有内生力的价值资源，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其现代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结合，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性、独立性等特征，则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为支撑，运用中国素材、回答中国问题。<sup>①</sup>同时，研究多聚焦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及传统思想资源的当代阐释，将其视为连接古今、激发创新的深刻根源与重要桥梁，强调其在塑造中华民族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方面的基础性作用。<sup>②</sup>此外，学界广泛探讨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义，认为其打开了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催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表达。<sup>③</sup>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理论阐发与价值倡导，对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及具体路径的探讨尚显不足；对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有效融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探究传统文化资源向自主知识体系转化的内在机理与可行路径，以凸显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向的统一。

## 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是“中国”的，正是因为它的概念体系、思维范式、价值追求都深深根植于厚重的中华文明，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脉和特色，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这一方针不仅是守护民族精神命脉、筑牢文化主体性根基的内在要求，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进行解构与超越的破局之要，还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体现了文化自觉、理论自主与实践创新的内在

---

① 参见孙正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② 相关研究参见：臧峰宇、沈江平、王立、王莅：《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和议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刘曙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曹建文：《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辩证方法》，《哲学研究》2024年第4期；刘建军：《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红旗文稿》2025年第8期；郁建兴、黄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3期。

③ 相关研究参见：项久雨、粟蓁蓁：《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理论构建》，《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孙乐强：《“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陈金龙：《构建中国现代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思想理论教育》2025年第12期；侯惠勤：《科学世界观的坚持运用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求索》2025年第6期。

统一。唯有在赓续文脉中确立自身坐标，在破立并举中打破话语桎梏，在返本开新中紧跟时代发展，方能真正激活传统智慧的当代生命力，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 （一）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根基的内在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身份标识。在世界文化深刻激荡的今天，国与国的根本差异不在于物质形态的表层呈现，而在于文明基因与精神世界的深层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得以在世界文明谱系中清晰界定“我是谁”的根脉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sup>①</sup>从“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到“文化中国”的文明意蕴升华，从《左传》“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的文化阐释到《唐律释文》“衣冠威仪、习俗孝悌”的身份界定。“中华”之名本就内嵌着文化认同的庄严承诺，这种“文化高于民族”的认同逻辑，使得五十六个民族凝聚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之下，共享“中国人”的精神称谓。文化主体性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象化的集体记忆与价值共识。唯有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可绕行的基本前提。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是激活传统智慧、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直接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sup>②</sup>文化主体性是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巩固的动态存在，需要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重构中与当代实践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鸦片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精神上的震撼与价值体系的动摇。胡适直言“我们百事不如人”，从制度到道德、从文学到身体，皆以西方为尺度进行自我贬抑；陈序经主张“彻底西化”，提出“西洋文化优于中国”的片面论断等。这些看似激进的言论背后，实则是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对文化无力感的集体焦虑。在这种由外部压迫引发的内部否定下，中华传统文化被贴上“停滞”“封建”的标签，从而陷入文化进化论的线性逻辑陷阱。正如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命题所示，一个民族若不能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便难以在剧变时代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已成为民族复兴的迫切需求。赓续中华文脉、重塑民族精神，要求我们通过现代视角挖掘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资源，将其融入中国自主的知识生产之中。然而，由于受封建时代生产关系、认知水平的局限，传统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糟粕成分，若不加甄别地全盘继承，还可能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而“双创”正是打破传统与现代隔阂的关键密钥，其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即剥离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落后性内核，提炼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精髓转化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概念，不仅让文化主体性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直接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素材与思想内核。

### （二）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霸权的破局之要

“西方中心论”长期主导国际话语体系，致使中国在现代化探索初期亦步亦趋，陷入对西方知识范式的依附。习近平总书记警示我们：“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71页。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296页。

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sup>①</sup>过去四百年，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历史叙事逐渐建构起一种看似“普世”的知识权威，其核心是将西方现代化路径等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正轨，打造所谓的意识形态霸权。这一话语体系不仅塑造了全球学术研究的范式，更深刻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自我认知与发展选择。近代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地学习与模仿西方的科技、制度乃至文化思想，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被大规模译介，学术研究逐步形成了“以西释中”的认知惯性。这种依附性忽视了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更在文化层面消解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使现代化探索屡屡陷入“错把他乡作故乡”的认知困境，凸显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摆脱西方话语桎梏的迫切性。

所谓“西方文明中心论”及其优越性并非历史常态，在漫长的“东强西弱”格局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亦曾长期引领全球发展。回溯公元500年至1500年，全球力量格局呈现出鲜明的“东强西弱”态势：中国凭借成熟的官僚制度、先进的科技水平与繁荣的商品经济，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隋唐至明清的历代王朝实现了内部的高度整合，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实力与文明吸引力。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等伊斯兰文明也在欧亚非交界地带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同期的西欧则深陷封建割据、宗教桎梏与黑死病的多重困局，整体发展水平远逊于东方。正如弗兰克“白银资本”的研究所揭示，即便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乃至18世纪中叶，西方虽在航海与殖民扩张上取得进展，但中国的经济地位仍凭借庞大体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显著优势。西方真正取得全球主导地位，是在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通过殖民扩张强行重塑世界秩序的结果，而非文明内在优越性的自然延伸。这一历史事实说明，“西方中心论”所标榜的文明优势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暂时现象，所宣称的文明线性进化图谱不过是服务于殖民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建构。重新发掘“东学西渐”的历史脉络，还原历史中世界文明多元共生、交互演进的真实图景，有助于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坚实历史支撑。

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场思想领域的“去殖民化”斗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其提供文化支撑，进而确立文明多元共存的认知范式。所谓“去殖民化”，并非否定外来文明的价值，其核心在于打破西方学术垄断与知识霸权，拒斥将某一文明经验绝对化、普世化的霸权逻辑，从而确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立场与理论框架。中华文明素来内蕴着深厚的和平性与包容性基因，这构成了其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显著标识与独特优势。“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的辩证智慧、“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共同构筑了一套处理文明间关系的独特伦理资源与话语体系。在此关乎文化主权与精神独立的宏大进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正是要激活并转化这些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使其从历史文本走入当代语境，从而提炼出标识性概念与原理性理论。这一过程有效解构了“文明优劣论”的认知偏见，同时也昭示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标，并非文化霸权式的强制输出，而是基于平等自愿的文明交流理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衷共济”“四海一家”“亲仁善邻”等精神标识，升华为回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智慧，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

<sup>①</sup>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 （三）以传统智慧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①</sup>这一论断从文明根基与知识本源的双重维度揭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深沉、更持久、更具主体性的源头活水，正是根植于五千多年文明演进积淀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母体以其绵延五千余年的文明韧性，将经史书集等经典文本所载的核心思想理念转化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知范式、思维方法与治理经验等。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活的精神源头与理论源泉，为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并赋予其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的文化定力、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由此生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便因扎根于本土经验的历史纵深感而获得了文化定力，其创新性也因此超越了简单的策略性应对或话语移植，具有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的本真性与独特性。

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挑战，内在地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实现面向中国问题与文明发展的知识创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其根本就在于它生长于这片独特的文化土壤。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历史文明绵长、社会结构多元的特殊国情下展开的一场文明级跃迁，其蕴含的五大特征，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也意味着其内含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从人口规模来看，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的艰巨性世所罕见；从发展诉求来看，既要破解区域发展与城乡差距的协调问题、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平衡问题，又要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等，这些难题既具有中国特殊性，也折射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困境，仅凭西方的现代化范式难以找到现成答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关于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独特智慧，日用而不觉的价值共识与行为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在“两个大局”中保持文明连续性与战略定力的深层依托。以“共同富裕”为例，它既承接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传统理想，又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其制度化、法治化，实现了从伦理愿景到政策实践的跨越。这一过程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有解释力与操作性的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模型，为破解中国式现代化难题提供了独特思路。

构建基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理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呼唤与其相匹配的理论建构，这要求我们扭转哲学社会科学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言必称希腊”的依附性倾向，构建一套立足中国实践、蕴含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②</sup>这一重大论断内含打破思想桎梏、开辟理论新境的核心要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高度契合的内容，转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养分。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学理化提炼，将“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等富含哲学智慧的概念范畴转化为现代学术话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标识；其次是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升华，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共同富裕、生态治理、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提炼为普遍性的知识成果与理论观点；最后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包容性融合，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形成兼具民族性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5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8页。

与世界性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不仅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还凝聚起全体人民的思想共识，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 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何以能够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阐释中国之理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关键进路。这一过程需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提供了辩证看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的科学方法。这种遵循本质上是在“第二个结合”开创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与“文化主体性”中，为“双创”确立了贯通古今的轴心，进而规定了“双创”的价值立场与理论边界，使其不再是方法论上的权宜之计，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文明发展之路，而“双创”则以实践形态具象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蕴涵与时代要求，前者立其魂，后者行其道，二者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上一体贯通、辩证统一。“双创”不是简单复古和盲目趋新，而是立足中国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动态过程。以此为指引，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互构中激活文化基因，驱动知识的内生性生长；在守正与创新的动态协同中突破既有范式，实现理论的原创性跃升；在主体性坚守与开放性借鉴的辩证统一中达成价值的共生共进，方能使中国知识体系既能植根传统文化、解释中国实践，又能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趋势，回应人类共同关切。三者统一于以中国之道回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伟大实践，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理路。

### （一）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互构中驱动知识内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脉，从“体”与“形”的双重维度为知识体系奠定内生性根基。从“体”之维度来看，中国古代先贤精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此衍生出许多治国之道、为人之学、修身之法，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坐标。这些思想理念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不仅为构建知识体系锚定其问题意识的生成起点，规约其价值判准的终极归旨，还使其区别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知识传统。从“形”之维度来看，传统文化通过其特有的术语体系、用语结构与思维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理解世界、阐释意义的基本方式。“道”“理”“气”“仁”“义”等范畴，以及“致良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实践方法，构建了一套自洽且富有解释力的系统理论，在现代学术话语中仍具备积极的影响力。通过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提炼与语义转化，激活其普遍的哲学意涵与思维价值，使之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框架体系实现对接，从而拓展了知识生产的表达边界。唯有淬炼此“形”之具象形态，扎根此“体”之深厚土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能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问题意识、理论逻辑与价值立场，实现知识的内生性生长。

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互构中驱动知识体系内生生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关键在于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在批判性继承中激活其现代潜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这一过程的前提。面对传统文化庞杂多元、精华与糟粕交织的现实，既要正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承认其烙印着抑制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级秩序固化等时代痕迹，也要对其进行辩证性地扬弃，敏锐发掘并萃取其中的“优秀因子”。在此基础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提供了方法指引。这意味着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传统资源中超越时代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伦理资源等进行再阐释与再创造，从而激活传统概念范畴的理论潜能，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学理性、逻辑性的现代

学术概念，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转化绝非牵强附会的比附，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双向赋能、彼此成就的过程，传统为现代提供精神滋养与文化原创性，促使我们重返经典挖掘思想资源并赋予其时代内涵；现代则为传统开辟新的诠释空间与生长路径，推动传统的概念范畴获得实践生命力。正是“传统滋养现代、现代重塑传统”的双向互动，深刻揭示了传统智慧的生命力在于其回应现实、指导实践的时代适配性。唯有将传统资源转化为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实践智慧，方能确保自主知识体系既扎根民族根脉，又能够随时代偕行。

## （二）在守正与创新的动态协同中实现理论突破

守正，不是固守成规，而是守住理论之魂、文化之根，核心在于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sup>①</sup>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帮助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潮激荡中穿透表象、锚定本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按照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要求，方能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不竭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文化实践的深度融合中实现了自身的丰富发展，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知识体系建构中缺乏科学思想指导的困境。这一结合不仅为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更引导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实践中，精准辨识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真正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和现代转化潜力的价值内核，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与深度诠释。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既体现为精神实质的相似性，也表现为功能互补性，更彰显为实践基础上的共生性。这种相互成就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牢牢扎根中华文脉，兼具鲜明民族性与文化辨识度，又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具备坚实科学性与真理力量。

创新为理论突破注入动能，在激活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基础上实现理论突破，让自主知识体系永葆活力和竞争力。“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sup>②</sup>从《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智慧，到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革决心；从近代“睁眼看世界”的救亡图存，到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这一基因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实践品格，驱动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实现突破。一方面，通过内容升华突破经验局限，赋予传统智慧现代学术张力。通过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当代实践的现实诉求，将传统文化中“大同”“均平”等朴素理念，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等具有现代学术张力的理论概念，让传统智慧获得普遍解释力和规范实践力，成为知识体系回应时代、引领思想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理论迭代，确保知识体系与时代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sup>③</sup>基于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紧跟人类文明发展前沿与中国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推动传统理念的转化发展，让知识体系始终保持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感知，使其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持续保持活力与核心竞争力。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26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 （三）在主体性坚守和开放性借鉴的辩证统一中达到价值共生

坚持“以我为主”锚定文化主体性根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形成植根本土、反映自身发展逻辑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立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自觉之上，这一主体性认知是对“何为中国”的哲学回答。先秦诸子百家竞相发声，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儒家以仁为核心重构礼乐秩序，规范了家国天下结构下的人际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伦理建构的价值遵循；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彰显了和平发展的价值追求；法家“明法慎刑”的思想彰显了思想服务于现实治理的实践品格等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知识体系的核心框架。至汉代，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经学的官方地位，将“五经”作为知识传播与价值认同的载体，使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在思想层面得以强化。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思潮与佛教中国化进程，则推动了儒释道思想的初步交融，王弼“得意忘象”的认识论、慧能“顿悟成佛”的修行观，丰富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思维方式。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更是将这种知识积淀推向新高度，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儒学经典成为知识传承的核心载体，玄奘西行取经与鉴真东渡传法的文化交流，体现了文化交流互鉴的理念认识。宋明理学的兴起则实现了传统思想的哲学化提升，程颢、程颐提出的“天理”范畴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认识论，重构了儒学思想体系，形成贯通天人、心性、理事的细密理论体系，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的思想，将主体意识与实践理性相结合，为中国知识体系注入了鲜明的实践品格。坚持“以我为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是要将这些思想理念中的优秀因子转化为能够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理论话语，从而形成内生于中国土壤、契合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知识体系。

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批判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互动中，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过程中完成，既要不忘本来，也要吸收外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根植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最终发展为以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科学范式。这一知识传统强调逻辑严密、方法规范、可验证性，虽在方法论和技术层面积累了可观成果，但背后也潜藏着深刻的意识形态预设与历史局限，倾向于将人抽象为“经济人”或“理性个体”，从而忽视社会历史的具体性与集体生活的价值维度，逐渐沦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价值独断。因此，我们对西方知识的借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将其置于中国的历史语境、现实问题与文化传统中加以检验与重构，积极吸收其在理性精神、逻辑方法、学科规范等方面的有益成果，从而不断完善和弥补自身不足。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也要求我们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知识生产与文明对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sup>①</sup>正是在这种主体性坚守与开放性借鉴的辩证统一中，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知识创新之路。

### 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②</sup>同时明确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3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9页。

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①</sup>这些论述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成果的体系化、学理化载体，其内在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相适应，促使其内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转化为规范化知识要素，在当代理论阐释、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传播与表达。通过学科融通打破壁垒，锚定本土需求夯实传承创新根基；以学术深耕深化科研赋能，完善知行转化的理论支撑架构；借话语构建立足本土对接国际，实现与学科、学术体系协同联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双创”，让不同学科在融通传统资源中形成共识，促进了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为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 （一）学科融通：搭建传统与现实交汇的学科交叉体系

打破学科壁垒是实现传统与现实衔接的前提，交叉学科的创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提供了实践载体。近代以来，西方分科治学的学科体系凭借其专业化、精细化优势传入中国，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经史子集”融通一体的学术格局。这种“分科治学”的西方知识模式虽在短期内提升了知识生产的效率，却将完整的知识世界分割为孤立的学科单元。而原本融通一体的中国传统学术被拆解为文、史、哲等单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经典文献沦为局部领域的研究素材。诸如《周易》的哲学智慧并非仅存于哲学，其在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等领域均有广泛研究与应用；《黄帝内经》的生命观虽核心应用于医学，但在养生学、体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也有延伸，等等。这不仅使其思想脉络和价值逻辑难以完整呈现，也削弱了其原有的系统性与实践性。因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必须首先突破西方主导的学科边界，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知识生产机制。而交叉学科的兴起恰恰为其提供了有效路径，它坚持“问题导向”而非“领域划界”重构知识生产范式，通过整合文史哲经、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力量，让传统学术中的整体性思维、辩证智慧与现代社会科学的规范研究形成互补，在当代学科体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聚焦时代需求构建本土化学科体系，为持续深化学科融通、激活传统学术生命力提供有力支撑。学科的发展本质是对时代需求的动态回应，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推动人文学科褪去神学色彩，工业革命时期文科形成独立且制度化的知识体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伴随着知识体系的重构与学科形态的革新。如今，我国已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快速时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发展需求的多元性迫切需要能够整合多学科资源的复合型知识供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承载数千年智慧的思想宝库，蕴含着破解现代社会矛盾的丰富养分，但其多以古典话语、经验形态沉淀于典籍与实践之中，难以通过现有学科框架实现与时代精准对接。因而要立足中国传统学术构建本土化学科体系，为学科融通与传统文化活化搭建长效平台。一方面，应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加强经、史、子、集等研究，加强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探索建设中国古典学。正如西方有古典学、神学作为独立学科，中国亦应有“中国古典学”或“国学”作为文化传承的现实载体，从而培养一批既能“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子集”，又能对接现代学术规范的复合型人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拥有独立的知识生产空间与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应学科融通需求的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机制，改变过度强调量化指标的评价导向，强化对整体思维、实践创新能力的评估，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宽松的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依据数字中国战略建立“智能传播与文化品牌”“数智人文”等交叉学科，使古籍文献、传统技艺等文化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结合并转化为数字知识资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活力支撑。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5页。

## （二）学术深耕：形成高效贯通协同的学术支撑体系

依托有组织科研系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支撑架构。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已不再是零散的、个体化的学术探索，而是一项关乎国家文化命脉与思想主权的重大战略任务。有组织科研以其目标导向、资源整合与协同攻关的优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是通过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领域专家的集体协作，不断推动着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阐释，彰显了跨学科协同在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优势。这种“大科研观”下的组织化运作，不仅提升了研究效率，更在方法论层面推动了传统人文学科的范式革新。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通过制度化平台统筹资源、分工协作、动态迭代，从整体性和总体性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再解读，使其转化为具有解释力、批判力和引领力的现代学术话语。

深化知行转化机制，构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学术生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成果有机融入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sup>①</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绝非单纯的学术阐释，而需在实践中完成价值转化与理论升华。然而，这一转化过程并非自然发生，需树立“从社会中来，回到社会中去”治学理念，形成“知行合一”的学术循环。一方面，文化研究者不仅要传统文化进行典籍考证、义理阐释，更要沉潜到田野乡间、工厂车间、城市社区等场域，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探寻真问题、挖掘活素材，从而更好地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新性理论；另一方面，研究成果要应用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文化传承等具体领域，通过政策咨询、公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式反哺社会，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唯有在持续不断的实践检验与理论升华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成果才能真正沉淀为具有解释力与指导力的学术话语，进而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构建分层分类、贯通古今中西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夯实主体基础。一切学术事业归根结底依赖于具有学术自觉与使命担当的主体力量。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关键要培养一批既“立时代之潮头”，又“通古今之变化”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基于此，需构建一种分层分类、贯通融合的人才培养新范式。所谓“分层”，是指根据不同阶段学术成长规律，设计本硕博贯通的培养路径，强化经典研读与原始创新能力训练，落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所谓“分类”，则是针对基础研究、应用对策、交叉创新等不同类型人才，制定差异化培养方案，避免“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尤为重要的是“贯通”：一方面是贯通古今，引导青年学者沉潜经典、厚植学养，在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还原中，理解中华文化在历史中的互动演化；另一方面是贯通中西，在比较文明视野下，既要系统梳理西方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内核要义，汲取其合理成分，又要以“中国之理”为坐标，审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与普遍性，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互鉴互融。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sup>②</sup>今日之学术使命，不在复古，而在以现代学术语言重述中国道理，以全球视野重塑文明对话。唯有如此，方能造就一批既能“为往圣继绝学”，又能“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大家，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生成提供不竭的人才动能。

<sup>①</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50页。

<sup>②</sup>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 （三）话语构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表述体系

立足中国立场对接国际话语，促进本土话语与全球通用表达的有效融通，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适配性。话语作为传递知识与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不同文明沟通对话的基本工具。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在世界舞台上被听见、被理解、被尊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sup>①</sup>西方学术界的通用话语和表达方式经过长期发展，客观上已成为国际知识交流的“通用语法”。基于此，合理借鉴其规范的表述逻辑、严谨的论证方式，使源于中国实践的知识成果能够以国际学界可感知、可认同的方式呈现，能够减少文化认知隔阂，提高跨文化沟通效率。因此，我们既要坚持用中国人自己的概念讲好中国故事，又要善于运用国际学界熟悉的逻辑结构与论证方式来呈现这些概念的普遍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话语融合实践，其将源于欧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土壤、文化心理和社会现实深度融合，创造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具有民族气质的新范畴。这种融合不是削足适履，而是“以我为主”的创造性整合。今日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同样需秉持此种辩证思维，牢牢把握本土话语的文化主体性与理论自主性，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筑牢话语根基。

以理论自觉引领话语创新，实现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协同联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阐释框架。理论自觉作为话语创新的逻辑前提，致力于推动中国学者在全球知识分工体系中实现主体性觉醒，表现为立足中国场域提炼原创性概念、确立知识阐释的主体性地位的意识与能力。这种自觉的本质在于本体论自觉，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认识到“两个结合”不仅是实践路径，更是理论生成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并非单纯的经济总量累积，其背后蕴含独特制度安排、治理逻辑与发展规划的发展创新。若不能将这一复杂实践上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话语，中国经验的知识价值将局限于具体情境，难以形成自主知识影响力。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sup>②</sup>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话语创新与学术发展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正是理论自觉在话语层面的集中体现。这些概念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不再依赖外来的思想坐标来定义自身，而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自主进行知识生产的思想产物。其形成过程本质上是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协同演进的结果。学术研究为话语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与思想养分，学科建设为话语体系搭建传播载体与发展平台，而话语体系则是学术思想与学科成果的外在表达，又推动着学术研究和学科内涵的丰富发展。通过持续强化理论自觉，推动三大体系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才能不断提升中国经验的理论穿透力与知识影响力，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发挥解释中国、引领时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 陈三宝 郭跃文]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页。